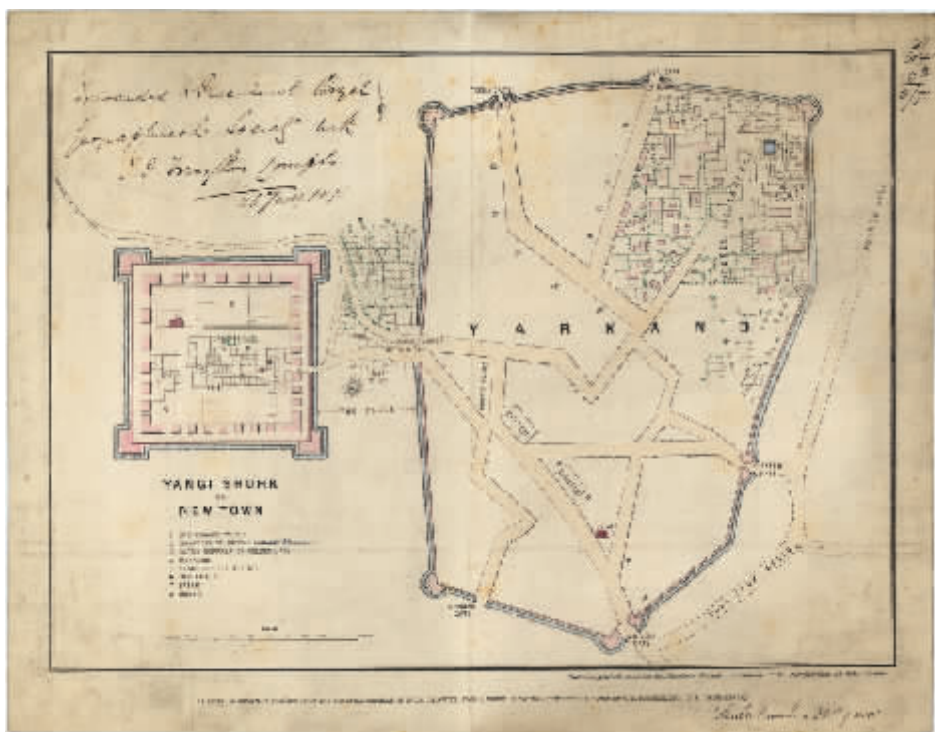




◀图2 一张1898年钱票及其背面的《新增重修上海县城厢租界地理全图》



▲图4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所藏1871年的叶尔羌城市地图(即今莎车县城)

◀ (上接6版)

现存其他地图中没有见到该图原本,推测应是依照以前的老图做在钱票上的,非常宝贵。他说:“我一心想把它收进去,可惜已有版本不够清晰。就在出版前,送稿给上海书画出版社王立翔社长签字时,他说认识钱票收藏者,便立马联络了对方,我们马上过去,拍摄了原图回来。”

之所以能担起《图集》编纂的重担,跟钟舂近20年对城市地图的关注不无关系,还有就是其早年留学日本时的收图和制图经验。他在京都大学的导师是金坂清则教授,为京大“地图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位地图收藏家。从制图经验方面看,日本近代制图跟中国的传递关系明显,民国时以制图技术人员身份来中国的人员,有些还健在。钟舂特别提到森三藏:“他于1941年来华,直到1948年才回去,经历了几个政权,非常传奇。森三藏自己就出过一本小册子,专门介绍在中国制图的生涯。”

收图没有完成时,不能一味求全,还要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数据库,这就要做好谱系的考察。对400多幅(册)地图进行整理之后,编纂组发现上海城市地图谱系大概有这几种:一是方志类地图;二是租界当局的系列实测平面图(工部局、公董局);三是《行名录》、字林洋行、英国海军航道局所制系列地图;四是近代晚期以来中外书商、舆图社制作的系列地图。只有谱系梳理清楚了之后,类型、条理和流变线索才会更加清晰、可靠。

这其中有个见真功夫的活,就是成图年代的考证。这不但但是地图史研究的一项基本功,也是《图集》编排与著录的一个关键要素。但钟舂表示,这个要素的判定存在多种复杂的情况,即使是那些明确标注年代的地图,也有测、绘、印、发行等时间的不同,有时还会出现测绘与刊印等年代相距较远的情况,“我看下来有三类图是经常要作年代考证的——近代单幅绘画地图、租界初期平面图和其他未注年代的疑难地图”。

在访图的经历中,《图集》编纂组还纠正过藏图机构标错时间的地图。近代初期上海英租界地图非常珍贵,以往学界一直认为哈佛蒲赛图书馆所藏1849年的《上海地图》(Map of Shanghai)时间最早,这次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发现一张标称1856年的地图(见图3),其中有的租地地块,实际应该是在1850年以前。后来经过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周振鹤教授和罗婧博士的共同分析,初步明确了这张图的绘制年代应在1847—1848年左右,刷新了哈佛《上海地图》的现存最早记录。

《图集》汇聚了诸多海内外现存的上海城市古旧地图,其中不乏佳作珍品,但因利用权、保密性,还有篇幅限制等,依然有部分地图资料未能收编进来。如近代以来俄、德、荷兰、西班牙等语种的上海地图,还有部分民间商社或外国外交机构印制的上海地图等。钟舂特别提到岸田吟香于1885年所制的《上海县城厢租界全图》一图,这是近代日本民间商社所绘最早上海地图,而制作者

岸田吟香也是近代中日交涉史上集商人、汉学家与谍报人员为一身的传奇人物。遗憾的是,经过多方查寻,还是没能获得清晰的影本,他表示将不会停止对这些缺憾的留意和收集。

正如上文提到,很多城市早就出版过古旧地图集,但上海长期缺位,而北京只出过两部分别收录有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和首都图书馆所藏北京古旧地图的地图集,并不全面。这两个重要城市的古旧地图集为何迟迟未出?因为“太难了”。北京和上海这两座城市,历史上绘制的地图数量繁多、收藏分散、测绘刊印与流行情况复杂,从未有机构做过系统的收集和整理,加之还要进行地图学史考证、研究基础上的著录、提要编制,都是最费时、费力的基础性工作。

周振鹤认为,对于近代的历史地理而言,有《上海城市地图集成》这样的基础性成果,那么编撰上海的历史地图就能省去不少麻烦,足够详细的基础研究,对解决历史问题是很有帮助的。“像上海这个城市,近代化那么快,我们不但希望实现每条路的复原,还希望做到每栋建筑的复原。我们心里一定要明白,已有的知识不一定是真的知识这个道理。比如,今上海外滩33号的原英国总领事馆建筑被称为‘外滩源’,这个说法就是不对的。‘源’是‘最早’的意思。可是,如果按照地块来讲,怡和洋行那块是最早编号的1号分地;如果按照租地地契来讲,第1号地契是宝顺洋行,也就是现在外滩汉口路路口那个地方。无论从哪方面讲,现在的外滩33号都不是最早编

号与最早租地的,自然就不是‘外滩源’。”在周振鹤看来,实实在在的学术研究应该重视基础性的、细致的东西,而非空谈务虚,也不要盲目地认为已有的知识肯定就是真理。他希望《上海城市地图集成》积累的经验能对其他城市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远赴海外寻找中国城市地图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就在《上海城市地图集成》这块硬骨头被啃下的同时,另一项与历史地图有关的工作——“外国所绘近代中国城市地图集成与研究”也在上海师范大学紧锣密鼓地进行。

据项目组成员、国家图书馆副研究员白鸿叶介绍,国图收藏的外国所绘近代中国城市地图基本确定在70种左右,以北京、上海为主,还有一些沿海开放通商比较早的地区和城市,比如天津、辽宁、山东、广东。绘制机构有上海工部局、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北平日报,以及二战期间国外的军事部门,像美国战略情报局、英国陆军情报部等。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成一农研究员主要负责英美各图书馆藏图的整理与编目工作。他坦言,无法长时间待在国外,以及图书馆很少有专门的地图目录,是两个比较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决定从网络入手,通过检索先把资料整理出来,做到有的放矢,再抽出一段时间出去调图”。

事实却是,通过在线目录检索地图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因为在各大图书馆中地图不像图书有很好的分类,检索起来并不方便。项目针对的是近代中国城市,而且倾向于中小城市,其城市名的近代英文拼法和现代完全不一样。成一农后来想到一个笨办法,用“China”做检索,再限定时间为1949年之前,“这样会检索出来很多条,仅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一家就有1196条,因为没办法再往下细分,只能一条一条去辨认内容,比如‘Indo-China’‘道路图’这种就可以直接排除”。

如何剔除用西文编目的中文地图,需要结合历史背景加以考证。成一农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说明:一个是一张绘制于1930年代、标题为“Dengzhou-Fu, Shandong”的地图,“我们当时就认为这是中国人所画,因为1930年代已经不用‘府’了,基本可以判断是清代地图在近代以后的重印,保留了原来的名字”。还有一张杭州的“府城图”,时间标识为“1900?”,“这也基本可以断定为中国人所画地图,一是西方人不会称为‘府城图’,二是他们绘制的地图一般都会标明具体年代”。

编目中的注音问题,成一农表示非常犯愁,至今还没有彻底解决。他进一步解释说,近代有三种英文拼写:一是闽南话拼写,西方人最初从东南沿海地区进入中国,所以有些地名用闽南话拼写;稍晚一点,很多地名用当时的中国官话南京音拼写;还有一些,则用满语、蒙语、藏语或缅甸语拼写,所以

(下转8版) ▶